·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20004/j.cnki.ujn.2026.03.006

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历史演进、动力机制

张轩豪　韩伟娟

[摘　要]阶梯式递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发展路径。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其实践图谱清晰呈现为由目标阶梯、动力阶梯、空间阶梯和治理阶梯构成的有机复合系统。这一现代化模式能够实现持续发展,核心在于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高效可持续互动,从非均衡向协调均衡的动态调整,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以及开放倒逼与内生增长的相互促进。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阶段性部署与实践策略,为人类探索更加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启示。

[关键词]阶梯式递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策略;唯物史观

阶梯式递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和路径的高度概括。2025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便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探索,通过制定长期、中期与短期发展规划,有步骤地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②]。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地揭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深入剖析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能够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与中国道路的认识;在实践上,既能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指引,又能为世界上寻求自主发展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镜鉴。

一、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发展序列

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图景而言,现代化并不是单一形态的,而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基本形态。从历史顺序看,资本主义现代化率先开启,并在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扩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依赖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殖民支配不断扩张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在资本主

[作者简介]张轩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韩伟娟(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邮箱:1969148687@qq.com。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页。

②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98页。

义现代化充分展开并暴露其内在矛盾之后,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批判、回应与超越而逐步形成的现代化实践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经产生时就同步完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初便自然展开的。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总是在特定生产关系、国家能力、技术条件和世界历史结构的共同作用中被逐步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14至16世纪即已萌芽,并在此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形态;但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化进程,是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才真正开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但真正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展开的,是以大规模机械化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发展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则构成了其特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内含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不断加深,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产阶级手中,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随之加剧。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现代化又通过殖民扩张、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不断向外部转嫁自身矛盾。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①。这一阶段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并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②。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直接殖民统治控制落后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建立工厂,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组织生产,以攫取超额利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工体系的形成。20世纪60至7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旧殖民体系逐步瓦解④。然而,殖民体系的瓦解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支配。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借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金融体系、产业分工和技术鸿沟,将发展中国家继续嵌入以西方资本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维持其全球影响力。到20世纪末,随着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始崛起。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往往以援助、贷款为由输出一系列附加条件,向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贩卖"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方案⑤。这种现代化模式表面上是"发展援助"和"制度改革",实质上则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落后国家对西方资本、技术和金融体系的依赖。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政治经济竞争加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剥削形态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占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过程,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人的数据、注意力、社交关系和日常生活之中。数字平台、算法系统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获得了新的扩张空间,也使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技术依附和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当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并不是稳定的发展和共同富裕,而是市场震荡、产业结构畸形、债务危机和社会撕裂时,人们也开始更加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必然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页。

②郭吴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西方经济的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④黄继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八卷)—— 马克思主义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与发展(1923年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94页。

⑤杨河等:《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3页。

通向人类福祉。

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的生成逻辑。虽然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已经悄然发展了五百余年[①],但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真正开启具有现实制度形态和规模效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转化为国家制度实践,也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现实的政治主体和制度载体。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工业化建设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于苏联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快速转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农业集体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基础,也由此确立了早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为核心任务,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资源动员和制度组织方式。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扩展为多国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从苏联一国的探索转变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普遍推进的历史进程。其间,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许多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效仿,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工业化动员能力,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基础、维护国家独立和摆脱外部依附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苏联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在完成早期工业化任务后,逐步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僵化、经济效率下降、创新动力不足、社会活力受抑等方面的问题。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曾多次试图调整既有体制,但始终未能真正突破原有模式的深层束缚。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简单照搬苏联模式,而必须结合自身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探索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一度进入低潮。这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自然完成的过程,也不是单纯依靠计划体制和国家动员即可持续推进的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真正形成稳定而有生命力的发展道路,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不断处理好生产力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活力、改革创新和人民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相继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不断加深。现代化是否只能沿着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否仍要依循苏联模式推进?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能否在不重复殖民扩张、不陷入外部依附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理论所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探索一种超越单一线性模式、符合不同国家历史条件和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推进,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回答。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个国家和民族最终都将走向现代[②]。但走向现代,并不是只有一种道路。现代化道路本身具有多元性,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世界处境,都会深刻影响其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既没有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依靠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的道路,也没有照搬苏联高度集中体制下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推进,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改善和民族复兴目标贯通起来,由此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

①何毅亭:《新时代·新思想》(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6页。

②朱可欣:《社会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①]。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多重发展任务同步推进、多种发展动力接续转换形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模式。从实践成就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在国家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改善中不断展开的现实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它以自身实践突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曾经长期受制于“苏联模式”的路径局限,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什么中国能够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保持长期社会稳定?为什么中国能够像攀登阶梯一样,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转换发展重点、接续发展动力,并形成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韧性?这些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逻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发展机理,即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发展任务的转换、动力机制的接续和制度优势的释放。

二、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形态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普遍原理为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态性、阶段性提供哲学依据。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②]。这一观点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呈现连续动态、循序渐进的内在特征。此外,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③]这一矛盾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在量的持续积累与质的阶段跃升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进程中阶梯式前进。马克思还将历史发展与地质层系相类比,指出:“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④],这一比喻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接续、累积性提升的鲜明特征。列宁进一步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清晰地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所具有的内在阶段性,为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内部的阶梯式递进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的直接理论依据。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体历史场域提出的重大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的、被动的、不用费多大力气的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去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的,积极有为的,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展变化的过程”[①]。这一重要论述立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实践上,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所具有的阶梯接续、量的积累、质的跃升的鲜明特征,为中国式现代化采取阶梯式递进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

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共同构成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的理论逻辑。阶梯式递进现代化理论的最大价值是“提出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方式和路径”[②],将现代化理解为有层级、分阶段的非线性过程。从概念上讲,“阶梯式”是指发展阶段的跃迁性和非连续性,强调现代化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重点发展任务。“递进”是指前发展阶段是后发展阶段的基础,新发展阶段是前发展阶段的升华。从具体内涵上看,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现代化发展进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的,强调发展的客观阶段性。二是现代化发展进程是非线性的,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三是现代化是连续性与飞跃性相统一、质变与量变交替的动态过程。总体而言,阶梯式递进的现代化发展观为审视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分析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相较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及欧美国家特定模式的现代化理论而言,实现了多维度的理论突破。第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单向度逻辑,将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等视为标准化阶段序列,没有全面考虑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面临的差异化矛盾与需求。而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认为现代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段性结果,突破了以帕森斯、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框架,并没有将现代化视为普适、趋同的过程。第二,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超越了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依附使发展“成为一种扭曲发展”[③]。所以依附理论主张边缘国家需与中心脱钩实现自主发展,但其悲观色彩与宿命论倾向忽视了内部能动性,而阶梯式递进现代化更注重内生动力与阶段目标的衔接。第三,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实现了对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为代表的欧美现代化模式的超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伴随着对外扩张掠夺,以资本无限增殖为底层驱动力,导致物质主义膨胀、贫富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对立加剧。“莱茵模式”在国家干预下主张劳资关系与社会福利平衡,但其公平性仍局限于资本框架内,剥削与压迫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彻底根除。阶梯式递进现代化发展观的核心正在于实现更高维度的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三、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图谱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试错、调整的宏大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必然是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同时,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呈现为阶梯式递进的动态历史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奠基与工业化探索阶段。其间,面对“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社会生产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核心目标。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通过156项重点工程的布局[④],初步建立了新

①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474页。

②朱训:《阶梯式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式》,《人民政协报》,2013年5月8日第C04版。

③陈建兰:《浅析卡多佐的依附发展理论——读〈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理论界》,2007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中国的工业骨架。195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体现了新中国从单一工业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战略扩展。在现代化动力方面,这一阶段主要是靠制度变革与技术输入双轮驱动。制度方面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及工商业改造等,技术输入主要是靠苏联援建。在1953年至1957年间,苏联派遣专家帮助我国建设了166个重大项目[①]。在现代化空间方面,“北重南轻”是这一阶段显著的空间布局特征。1957年,东北已经基本建成特色鲜明的重化工业基地[②]。1964年,三线地区的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③]。在现代化治理方面,这一阶段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由于体制的僵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978年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为24.3%[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即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递进目标。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动力是农村改革与要素驱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普及,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3.8%[⑤]。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跃升至29%,到1995年,几乎占我国工业的半壁江山[⑥]。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空间布局,实现了经济特区的试验性突破。1986年至199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0.5%[⑦]。这一阶段的现代化治理方略,是通过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探索,逐步扩大市场经济空间。到2000年,中国GDP总量达89404亿元,人均水平达7040元左右[⑧]。

新世纪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跃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旨在将此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⑨]。推动这一阶段转型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和互联网经济。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将创新驱动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00年的0.9%[⑩]逐步提升至2012年的1.98%[⑪]。互联网经济成为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新经济形态。在这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初步转型,验证了阶梯式递进的现代化发展通过量变积累实现质变的规律。在现代化空间建设方面,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区域协同发展,密布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多项协调战略。在现代化治理方面,这一阶段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创新社会治理为主,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逻辑成效显著,为后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了稳固根基。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其核心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全方位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到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公报》,https://www.doc88.com/p-1058554448874.html,2025.11.02.

②石建国:《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万泽民:《中国共产党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

④谢明干,罗元明:《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⑤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⑥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投资: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⑧王梦奎等:《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⑨共产党员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fuwu.12371.cn/2012/09/27/ARTI1348734708607117.shtml,2025.11.05.

⑩任泽平,罗志恒:《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4页。

⑪樊增强:《国际视野下中国创新能力:成就、特征与体系性突破》,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57页。

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共同富裕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在核心动力方面,新时代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该阶段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0年占GDP比重达2.4%[③],重塑了传统产业并推动了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则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为核心,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技术路径。空间布局上,新时代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④]的新发展格局为核心任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项目落地实施。治理模式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⑤],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回应社会转型期复杂问题,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确保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是阶梯式递进的,表现为目标、动力、空间和治理的递进性。其目标阶梯是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最终迈向“共同富裕”;动力阶梯是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动能迭代与接续;空间阶梯是从“沿海先行”到“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再到“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治理阶梯性是从“计划管理”到“计划与经济双轨”,再到“多元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以阶梯式递进模式,在提高经济实力、协调区域关系、增进民生福祉,以及开放共赢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伟大成就。探究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何以可能,对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何以可能的因素是多维的,其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高效、可持续互动。回溯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由上而下的战略引领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之间,形成了高效的、可持续性互动。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通过大战略确保国家整体航向,明确基层发展方向,划清基层发展边界与禁区。在战略清晰路径模糊的情况下,党中央为基层预留了自主空间,允许其在特定领域进行试验性改革。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以及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等,都是基层创新冲破旧有体制桎梏的有力证明。而顶层设计是党中央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归纳经验而形成的,并通过政策推行至全国执行。这种从基层探索到顶层总结再到全国推广的科学循环,是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的精髓。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这种阶梯式递进的方式,控制了改革的不确定性,避免了因变革可能造成的社会失序,确保了现代化进程的稳定性。

二是从非均衡向协调均衡的动态调整。由于中国是区域差异巨大的超大规模国家,其现代化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9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③陈宇学等:《创新驱动发展经济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3页。

④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6页。

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进程不可能做到全域统一。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利用区域间的势能差培育增长极,从而牵引全局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阶梯式递进的关键路径。“一五”计划期间,重点布局重工业与基础产业建设,在区域层面初步构建了发展势能差;改革开放之初,基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①]的战略思想,很多地区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革新,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势能。随之,沿海地区依托政策与地理优势率先开放,带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十三五”时期,通过脱贫攻坚战促进全国范围的均衡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十五五”时期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在动态协调的持续性上持续发力。这种从非均衡到协调均衡的动态调整机制,符合经济增长的极化理论,通过极点的扩张力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公正的追求。

三是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阶梯式递进的成功关键在于,形成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保改革的正向循环。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如果没有通过改革开放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机制障碍,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快速发展。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阶梯式递进,都是为了通过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稳定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兼顾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承受度,通过渐进式而不是颠覆性的现代化模式,规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式的社会动荡;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在改革中“守正创新”,在发展中“统筹效率与公平”,在稳定中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持续推进。

四是开放倒逼与内生增长的相互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过程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高度相近。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引入外部资源的同时,还使中国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这一机制与内生增长相互作用,加速了国家与社会的转型与升级。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都是中国通过开放倒逼政府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倒逼企业升级产业、改善服务、促进技术进步的生动案例。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大规模修订了法律法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极大提升了国内市场的运行效率与竞争力。当然,中国在利用开放机遇的同时,始终注重培育内生增长动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逐步建立起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创新机制。如今,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中国的内生创新能力已成为驱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综上所述,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由多重子系统构成的复杂体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互动解决了“如何改”的方法论问题;非均衡到均衡的协调解决了“空间上如何布局”的战略问题;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解决了“进程上如何可控”的保障问题;开放倒逼与内生增长的促进解决了“如何持续”的动力问题。这四大机制协同发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关键答案。

五、结 语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传统的以线性增长和爆发式追赶为特征的现代化路径,正日益显现其局限与风险。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中,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未来,这一充满智慧的战略决策将继续指导中国有节奏、分阶段、可持续地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将注重从扩张规模向增长韧性转变。韧性思维正在成为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范式。从当前的政策来看,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将更加注重经济韧性、社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会韧性与生态韧性的建构。在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将更加强调自主可控和抵御外部冲击。在现代化社会建设方面,中国将通过强化制度建设解除公共危机,解决阶级分化,增强社会凝聚力与互助能力。在现代化生态建设方面,中国将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发展循环经济、修复生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保障现代化的永续性。“阶梯式递进”现代化模式,不仅追求发展的速度,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动态平衡性。整体上,未来中国将从效率驱动型的治理体系,向多元共生、法治、协同的韧性驱动型国家治理体系转变。

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将注重从技术赋能向人本智慧提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的革新,加速了现代化进程的递进,但数字的鸿沟、算法带来的偏见、技术产生的壁垒,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构建中,技术的阶梯式进步,本质上是要实现人的价值的阶梯式提升,而不是通过技术驯化人类。要确保技术始终是人的延伸。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技术方面的未来发展方向,将会把人类从机械性、重复性、低价值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有更多的精力、时间投入到更高阶的活动中去,通过技术的共享使人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从梯度势能差向全域协调拓展。改革开放以来,空间战略通过劳动力回流、技术扩散、产业转移的方式,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这种战略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鸿沟等问题日益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对内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效应也受到“虹吸效应”的阻碍。因此,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的全域协调发展,将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内部循环,改变将沿海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内陆的“雁阵模式”,建立更加科学的“功能链式分工”,东中西部、城市乡镇将在一条价值链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是简单的上下游关系。

由此可见,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的方法论,也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能力。它不是简单追求速度与规模,而是在发展节奏、结构协调、风险应对和价值目标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内在统一。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增强系统韧性中保持稳健,在技术进步中守护人的主体地位,在区域协同中推动共同发展,进而不断增进现代化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福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阶梯式递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也为人类探索更加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郑　毅]